



· 人物传记 ·

人民·联盟文库

JIANG JIESHI QUANZHUAN

蒋介石全传

(上册)

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使蒋介石声望陡增，1925年11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致蒋介石祝捷电云：“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竟之志，立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威声，凡属同志，莫不钦感。”简直把蒋介石吹捧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而蒋介石也踌躇满志，以拿破仑为榜样，在战争中辑《拿破仑战略语录》，以左倾的言论，显赫的军功，敞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大门。

张宪文 方庆秋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联盟文库

蒋介石全传

(上册)

张宪文 方庆秋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 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 展示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 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 注重市场价值，

要为读者所喜爱；5. 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 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入以下图书：1. 套书、丛书类图书；2. 偏重于地方的政治类、经济类图书；3. 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 个人的文集、年谱；5. 工具书、辞书。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199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编著的《蒋介石全传》。当时，我们根据已掌握的史料，试图勾画出蒋介石的一个真实的、较为完整的面貌，也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他撤往台湾后的各方面活动。但是，我们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说，有相当多的重要史料流落台湾和海内外其他地方，我们还没有看到和利用。在史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就难以理清蒋介石一生的历史脉络。1997年2月，台湾当局在各方面呼吁下，决定开放“蒋中正档案”（即“大溪档案”），供公众查阅。这是一批数量十分可观的原始档案，总数达4200册，273000件，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手迹，其重要性及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时，本人正好在台湾中央大学讲学。作为大陆学者，有幸第一个目睹并查阅了这些档案。中央大学设在桃园县中坜市，与典藏这批档案的国史馆相距数十公里。我每天乘汽车、电车往返，其辛苦可想而知。该馆至今仍规定这批档案只能抄录，不许复印、拍照，因而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并消化这批档案是不可能的。大陆学者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台湾。蒋介石有一部较为完整的日记，它并没有与上述档案一并交与国史馆收藏。据说，该日记被蒋家后人拿走。名人日记虽然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譬如日记作者并不一定完全暴露他的真实思想及其作为，但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撰写蒋介石的传记，不仅要写他的家世和主政期间的活动，也要深入地

研究一下他的性格、作风、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手段。这些方面在“大溪档案”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这部《蒋介石全传》，限于当时条件在史料方面有一定的缺陷，但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历史地位的评估，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对蒋介石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全传》早已脱销，现在河南人民出版社打算重新印刷，我们借此机会对全书内容作了部分修订和补充。我们期望将来这本书再版时，能够充分运用“大溪档案”和其他新史料，写成一部更为完善的蒋介石传记，为史学研究作出贡献。

张宪文

2004年4月25日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绪 论（初版）

蒋介石这个人物，在中国妇孺皆知，他的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活动，常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可是，如何评价蒋介石，曾长期成为史学工作者不敢涉足的禁区。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党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曾对人民群众起过重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40多年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迫切需要全面认识蒋介石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把他放到近现代历史的大潮流中给以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以便分清他的是非功过，明确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早在1979年3月，我国史学界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制定史学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其中《蒋介石研究》这个科研项目，由我们接受下来，并迅速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蒋介石的有关史料。1987年，国家教委又将这一研究列入博士点基金项目，积极给予支持。可是，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研究工作时断时续，资料整理工作亦没有结束，特别是台湾方面有关蒋介石的“大溪档案”，至今尚未公布，因此，要全面、准确地研究蒋介石，在资料上还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困难。我们撰写的这部《蒋介石全传》，不完善处在所难免，还有待于海内外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一)

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推翻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蒋介石出身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据 20 世纪 50 年代调查，他家有土地 20 余亩，这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商人家庭。

蒋介石的青年时代，即 20 世纪初年，正处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极端腐败的时期。这时，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和带动下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到国外去寻求中国革命的出路。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去日本学习军事，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对蒋介石震动很大。他由日本整装返回上海，受陈其美命赴杭州参加了光复浙江之役。1913 年“二次革命”发生，孙中山起兵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又奉命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策动肇和舰起义，攻打江阴要塞等。这些行动虽未得手，但他表现的革命精神是无可非议的。1916 年蒋介石 30 岁生日时，孙中山以“教子有方”表彰其母王采玉，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的称赞。

1917 年 7 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倡导护法。蒋介石上书孙中山提出声讨北洋军阀的作战计划，并应孙中山电召到粤军中工作，制定了“援闽”作战方案。其间，蒋介石虽因在粤军中发生矛盾，几度辞职返沪，但他南下广州并不是投机革命。特别是在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公开发动武装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处境极端危难的时期，蒋介石得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的电报，于 29 日由上海抵达广州，登上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叛军。离沪前，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表示“非铲除叛贼，誓不生还”，并嘱托后事说：“惟

对于两儿教育之责未完，吾爱纬儿，思之尤难为怀。惟此不无挂念，如有不测，则请照弟留某之函代之。”^① 这两封信至今仍保存在张静江的个人档案中。

蒋介石去广州，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因为在 1916 年 5 月陈其美被北洋军阀暗杀后，蒋介石在政治上失掉了靠山，心情十分悲伤，一度在上海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对这段腐朽糜烂的生活，蒋介石自己毫不掩饰。他在 1924 年写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信中，自白为“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②。1921 年，蒋介石在上海以“蒋伟记”名义和张静江等 21 人，合资经营“恒泰记交易所”；又与同乡好友戴季陶、陈果夫、张静江等 7 人，合营“利源号交易所”^③。

蒋介石经营证券生意失败后南下广州，使他有较长时间追随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有所作为。特别是从 1922 年 6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蒋介石在永丰舰上陪伴孙中山 42 天，进一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回上海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极力颂扬孙中山，斥责陈炯明的背叛行为。孙中山为该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④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赖和评价，还流露在孙中山写的祭蒋母文中。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山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孙中山很快委蒋介石以重任。1922 年 10 月，蒋介石担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准备由福建开赴广东讨伐陈炯明；1923 年 3 月，蒋又担任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②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 6 册，1937 年印行本。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④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 4 册，1937 年印行本。

营参谋长这个孙中山身边的重要职务。蒋介石迅速进入革命队伍上层，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二)

蒋介石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不仅导致两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也使海峡两岸长期分离 40 年，为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幸。

孙中山在革命中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1922 年决定改组国民党，坚持以俄为师。为了学习苏联革命经验，1923 年 8 月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党务、政治和军事等。对于去苏联访问，后来 1956 年蒋介石在台湾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①

但是，蒋介石访苏归来，他的政治思想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在写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国共合作的意见”^②。这个《游俄报告书》始终没有公布，但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在其撰写的《沉思于慈湖之畔》中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更多地流露在 1924 年 3 月 14 日写给

①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9，第 31 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 年版。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9，第 30 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 年版。

廖仲恺的信中。他在信中攻击苏联对中国“殊无诚意可言”，把苏联与其他帝国主义并列，说“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诬蔑中共党员是“俄奴”，说廖仲恺如不听他的劝告，“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①。

但是，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心没有动摇，没有接受蒋介石报告书的意见，并且坚决加以批驳。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②

一方面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和坚持主张，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共合作是人心所向，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充分，因此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两面态度。1924年4月，他重返广州主持黄埔军校工作以后，在政治上一反常态，由对国共合作持异议，转而把自己扮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词中说：“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他说：苏联“同我们真正联合在一条战线上，共生死，同患难”，“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非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非仿效他们不可。”^③ 蒋介石迎合国共合作的时代潮流，目的是等待时机，夺取更大的权力。

这一时期，蒋介石确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工作。如他奉孙中山之命，率黄埔军校学生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为讨伐盘踞广东东江一带的陈炯明，蒋介石率黄埔军和粤军等，进行了两次东征；并回师广州，在工人农民的配合下，粉碎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活动。这些行动，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胜利

① 蒋介石：《致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04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第3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③ 《蒋介石言论集》，世界书局1927年版。

地进行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应该说是有成效的。两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打倒了一个半北洋军阀（一个吴佩孚，半个孙传芳）。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反对北洋军阀的态度是坚决的。

但是，蒋介石从办黄埔军校开始，并不准备真正与共产党合作，他的反共意识在一步步增强。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务整理案》，是蒋介石策动的反共尝试。只是由于蒋介石实力有限，还不能与共产党完全决裂，故继续维持着合作的局面，但是反共的挑动和摩擦已经不断发生，直至1927年终于发生了四一二反共事件。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与共产党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企图彻底消灭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也加强了反共活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不断遭受破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攻，不仅占领全东北，而且将侵略势力伸入华北和华东地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不断受到威胁。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自1935年底国民党又开始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放弃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逐步走上积极抗战的道路。1937年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并没有给共产党以平等的地位。他虽然放弃了十年内战期间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但是仍然坚持反共，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逐渐倒退。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蒋

介石密令加强反共，严格取缔各地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摩擦，先后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蒋介石和国民党虽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继续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热切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协商解决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可是，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形势和国共双方的力量，坚持反共、独裁、内战的方针，并依靠美国的支持，最终导致内战全面爆发，国共谈判破裂。由于蒋介石的政策，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潮流，其统治政权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即被共产党力量摧毁。蒋介石流落台湾以后，仍坚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顽固政策，阻挠海峡两岸统一，给国家民族带来不幸，亦使两岸同胞骨肉遭受长期分离的痛苦。

(三)

蒋介石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却不时采取妥协退让甚至屈辱的政策。

研究和分析蒋介石当政期间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和对各国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且非常复杂的问题。他在处理许多重大的涉外问题中，都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也有他本人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

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蒋介石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关心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在这种形势下，形成了他的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1912年春，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①之后，在东京主编出版了《军声》杂志。杂志上发表了蒋介石撰写的《发刊词》、《军政统一问题》、《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及《征蒙作战刍议》等六篇论文，集中地反映了蒋介石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办这个刊物的目的，就是“揭破各国之阴谋”，“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②。文章指明英、美、俄、法、日都是帝国主义者。他说：“今日之列强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其思分割此一片干净土者，不啻一二，使非恃此一强有力之政府而为之对抗，岂能人自为战乎？”^③对俄国图谋中国蒙古之野心，他说：俄国“此后之处心积虑，乘机攘夺之举动，恐未中止，吾国人岂犹得高枕而卧乎？”^④对日本侵略满洲，他说：日本“用全力以谋我者，几有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之势，司马昭之心，夫固路人皆知矣！”^⑤他还认定英国对西藏怀有领土野心。因此，蒋介石希望“吾国亦当同仇偕作，奋赴前敌，而为孤注之一掷。”^⑥

蒋介石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他以后的政治立场和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册，1937年印行本。

② 《军声杂志发刊词》，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4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③ 《军政统一问题》，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7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④ 《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28—29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⑤ 《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28—29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⑥ 《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20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对外交涉是关于南京事件和济南五三惨案的处理问题，对此，蒋介石表现了屈辱、退让的态度。他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事件，不采取坚决措施，反而答应向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道歉、赔偿、惩凶。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人掠地的罪责也未追究，虽然表示要“实地调查”，实际不了了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事件是“改订新约”问题。1928年以后，与十多个国家重订了新的“友好通商条约”或“关税条约”。这些条约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增加了国家的关税收入。有关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虽因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未能实现，却也否认了它的合法性。“改订新约”运动，有不彻底的方面，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有积极的意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日交涉日益频繁。蒋介石亦经历了由不抵抗到积极抵抗到消极抵抗的演变过程。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但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企图以让步妥协缓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以相当数量的军队去围剿工农红军和排除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力量，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较大程度上危害了中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时候，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逐步强硬起来。这表现在1935年底由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等的谈判，僵持一年之久，仍未达成协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蒋介石仍然幻想以谈判解决中日争端，并且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双方军事态势和满蒙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妥协条件，换取日本放弃对华扩大侵略的政策。但是日本方面不予理睬。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本方面不断提高价码，要求蒋介石放弃反日反满政策，并且把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长江流域，这无异于要蒋介石政权垮台。就连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

是极端不可能的。”

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日本对蒋介石不断诱降，蒋介石在谈判中采取了有条件的妥协政策。只要这些条件能够保持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不受侵犯，就不能认为蒋介石投降卖国，亦不能把蒋介石的妥协让步与汪精卫的汉奸政策混为一谈。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中亲英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有着重要影响，蒋介石政府曾以大量经济利益换取美国的支持。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企图取代日本控制中国，但是，蒋介石并不完全听从美国政府的驱使。史迪威事件的发生，不仅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个人间的冲突，也反映了美蒋双方政策的矛盾。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迫切需要美国更多的军事、经济援助。美国国内资本家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中国这一广阔市场表现了更大的兴趣，因此双方都希望尽早缔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条约是在“互惠”的幌子下所签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其结果将使美国独占中国的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外贸和其他经济命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条约被美国参议院刚刚批准，即成了南京政府的随葬品。

(四)

蒋介石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向前迈进。

南京政府建立后，为了稳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1928年，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先后在上海、南京召开有银行界、财政界、实业界首要人物参加的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首先改革了税收制度，整理了三税（关税、盐税、统税），统一了财政

制度，增加了财政收入。并且在 1935 年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白银国有，防止白银外流，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统一了币制。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也为蒋介石进行内战筹措了经费。

由于财政收入增加，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战争，全国发生灾荒，加上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以及 1929—1933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使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曲折缓慢的发展历程。至 1936 年中国社会经济达到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发展水平，为支持抗日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国民党政权支持下，形成了以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为代表的私人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在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私人官僚资本。但是，至今我们仍未发现有价值的关于蒋介石的投资经营史料。蒋介石凭借政治权力给官僚资本主义以支持，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官僚资本主义者利用政治权势和通货膨胀等，大量掠夺和聚集财富，并且与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蒋介石在 1927 年以后，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政治制度。他通过国民党中央制定了《训政纲领》，并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孙中山提出的建国三序方略，其训政思想的原意是提高广大民众的现代化意识和参政意识。蒋介石领导制定的《训政纲领》，是将民众放在被训导的地位，而不是给群众以广泛的权力，使之在参政过程中，不断提高参政意识和现代化意识。《训政纲领》的要旨，是将国家政权、治权悉归国民党。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还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